

Dongnanya Huawen Shige
Jiqi Zhongguoxing Yanjiu

东南亚华文诗歌 及其中国性研究

朱文斌 著
ZHU WENBIN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南亚华文诗歌及其中国性研究/朱文斌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308-17667-5

I. ①东… II. ①朱… III. ①华人文学—诗歌研究—东南亚 IV. ①I330.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3666 号

东南亚华文诗歌及其中国性研究

朱文斌 著

责任编辑 包灵灵

责任校对 杨利军 陈思佳

封面设计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绍兴市越生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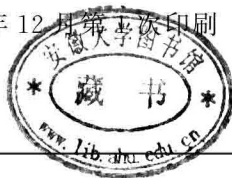
印 张 17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667-5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bs.tmall.com>

序

中国性问题，曾一度在马华文坛上闹得沸沸扬扬。主要是“去中国性”“断奶”等提法，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如今，争论早已平息，而且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如何理解中国性与马华文学以及整个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关系，如何理顺中国性与本土性的关系，仍然困扰着马华文坛，仍然没有正确的答案，也见不到令人信服的著作。因此，当我读到朱文斌的《东南亚华文诗歌及其中国性研究》的书稿，颇有点惊喜的感觉。

朱文斌是我在职时招收的最后一位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又考上南京大学，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次年，他开始为选择学位论文题目做准备了。究竟是选择中国现代文学，还是选择海外华文文学，他有点犹豫。因为，这不仅是选择论文题目问题，同时也是选择今后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问题。为此，他曾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给他提供的建议是继续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理由是：

一、中国现代文学只有30年历史，为了研究这短暂的30年文学史，我国已经有了一支庞大的教学科研队伍，而且每年还不断有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使这支队伍变得更加庞大臃肿。打个比方，如果有数千名运动员拥挤在一条狭窄的跑道上进行百米赛跑，那么即使不发生踩踏事故，也很难有运动员脱颖而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则不同，虽然也有一些研究人员在写文章，但大多数是票友，真正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为专业的，少之

又少。物以稀为贵,哪一个领域更有发展前途,不是明摆着吗?

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如果从1952年王瑶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算起,已有50年历史了。这50年来,已出版的文学史、专著、论文集、资料、评传、传记、访问记、丛刊、史料,以及发表在各类报刊上的单篇论文,数量十分巨大,要想再产生新的创见和独到见解,不容易了。人云亦云,必然平庸。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则不同,无论选择什么题目,都是新的。这是一片尚未经过深耕细作的处女地,土壤肥沃,只要努力耕耘,必能收获丰硕的成果。

朱文斌的突出优点就是从善如流。他听从了我的意见,确定以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他的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20年来,他在这一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努力拼搏,成绩斐然,已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名家,在海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朱文斌的新著《东南亚华文诗歌及其中国性研究》,先是以“东南亚华文诗歌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功获得立项。经过几年的打磨与修改完善,于2014年提交结项,得到同行专家的高度肯定,以优秀等级结题,最终结项题目定为“东南亚华文诗歌与中国性关系研究”。如今,这部书稿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汉语“中国性”一词,是从英语 Chineseness 翻译过来的。Chinese 是中国,ness 是英语后缀,表示性质、状态等。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Chineseness 就已出现在一些与中国有关的英文著作中,其内涵可因文章的内容不同而有些许差异,但大体上是指中国特色、中国元素、中国风格、中国想象、中国概念,等等。

中国性本应是一个中性词,但当黄锦树、林建国、张光达等一班年轻气盛的马华作家将此词用在有关马华文学的论文的时候,却把它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他们认为,“中国性令马华作品失掉创造性,令马华文学失掉主体性,使马华文学成为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文学的附属,成为大中国文学中心的边缘点

缀。认清中国性所带来的危机和障碍，迅速做出调整转化，把毒瘤果断的切除，无疑是所有马华作家的重大任务”。在他们的笔下，中国性变成一种十恶不赦的东西，是必须切除的“毒瘤”。因此，他们呼吁，必须“去中国性”，必须“断奶”。

早就听说黄锦树的狂妄和自负，但让我能有机会目睹黄锦树的狂妄和自负的，却是1997年到吉隆坡参加马华文学研讨会的时候。会上，黄锦树宣读了题为“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的论文，对马华前辈作家方北方进行了严厉批判和彻底否定。

方北方是马华文坛的元老，在马华文学草创时期，他斩辟蒿莱，拓荒播种，为马华文学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方北方已经出版的20多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显示了马华文学的实绩。其代表作《头家门下》，即使与大陆、港台的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正是由于方北方的毫无争议的文学成就，使他荣获第一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奖。不可否认，黄锦树的学历比方北方高，理论素养也可能比方北方强，但这些都不能成为其狂妄自大的资本和否定方北方的理由。一个远古时代的古朴陶罐，放在博物馆里，人们尊称为国宝；在拍卖行里，往往能拍出天价。但是，那些随处能够买到的现代精美瓷器，却连进入拍卖行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没有远古时代的古朴陶罐，就没有现代的精美瓷器。人们在享用现代精美瓷器的同时，总是会对发明制陶技艺的人类祖先心怀敬仰的。

在上面提到的那次研讨会上，黄锦树激情四射，火力全开，不仅针对方北方，也针对整个马华文坛。他挖苦、讽刺坚持现实主义写作的马华文坛是从中国大陆“搬尸”，语言十分尖酸刻薄。

在《东南亚华文诗歌及其中国性研究》一书中，朱文斌以东南亚华文诗歌为研究对象，条分缕析地阐释东南亚华文诗歌与中国性的复杂纠葛，揭示中国性是东南亚华文诗歌/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内在属性之一，无法亦无须去除。他认为，选择华文（即汉语）作为文学书写的工具和载体，就意味着中国性的

不可离弃,这是因为中国性早已深深地内化于华文/文化之中。同时,他又强调,东南亚华文诗歌具有中国性并不妨碍其独立自主的发展,反而强化了其本土性,从而论证了黄锦树等人的“去中国性”和王润华的“后殖民论述”的谬误。全书例证丰富,论证严密,结构合理,行文流畅,理论阐释与文本分析结合较好,是一部既有理论深度又有文采的著作。除此之外,我认为此书还具有下述特色:

一是自成体系,独具一格。整部著作围绕核心概念“中国性”进行论述,从诗歌史的视野出发,将东南亚华文诗歌的发展分成三个时期,即侨民文艺时期(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挣扎求存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和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中国性”的呈现方式的观察和分析,最终得出结论:东南亚华文诗歌的发展不论出于何种需要,都不可能脱离中国性。全书的章节安排是非常合理的,不仅自成体系,且逻辑性很强。

二是研究方法多元,见解独到。整部著作采用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运用比较、归纳、分析、例证等研究方法,将理论阐释与诗歌文本分析结合起来,集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社会批评于一体,重点梳理了东南亚华文诗歌在“中国意识”“中国情结”“中国经验”等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性”之表现,从每个阶段的诗歌文本出发,结合社会历史背景,深入论述和阐释了东南亚华文诗歌与中国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观点新颖,见解独到,结论也发人深省。

三是时代性较强,理论联系实际。整部著作都以史料为依据,不但简明扼要地梳理了近百年来东南亚华文诗歌发展史,而且还结合全球化时代背景,理论联系实际,论述了全球化时代东南亚华文诗歌的现代化问题。作者在全球化背景下考察东南亚华文诗歌的发展,认为东南亚华文诗歌现代化的结果就是迈向全球化,因此必然会遭遇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冲突、世界性与中国性的冲突以及世界性与本土性的冲突。当然,有冲突也会有融合。这种世

界性与民族性、中国性相融合的特质,突出表现在都市题材的书写和“中西合璧”的表现方式两个方面。作者论述深入,能够自圆其说,将东南亚华文诗歌的现代化问题与其中国性表现结合起来,有自己独到的思考。

《东南亚华文诗歌及其中国性研究》是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东南亚华文诗歌专著,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问世,必能引起读者和同行专家的重视和好评。本书作者朱文斌正值壮年,年富力强,创作力旺盛,相信他必能进一步攀登学术高峰,奉献新的成果。今年6月,朱文斌申报的“中国海外华文文学学术史研究”,已成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批准立项。此书完成后,他还将主编四卷本的《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史》。我们期待他有更大的成就,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陈贤茂

2017年10月8日于汕头大学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绪 论	1
一、东南亚华文诗歌发展概述	2
二、中国性与东南亚华文诗歌	12
第二章 中国意识阶段：“侨民文艺”时期的东南亚 华文诗歌	19
一、民族主义与中国意识的形成	20
二、现实主义诗潮的承继与发展	37
三、南洋色彩的开掘与文艺独特性的提倡	64
第三章 中国情结阶段：挣扎求存时期的东南亚 华文诗歌	80
一、中国情结与南洋认同	81
二、现代主义诗歌的兴起与论争	93
三、天狼星诗社与五月诗社	110

第四章 中国经验阶段：新时期发展中的东南亚	
华文诗歌	123
一、中国经验与多元化格局	124
二、后现代主义诗歌与多重困境	133
三、“后殖民论述”与“去中国性”	151
四、双重文学传统与多元文学中心	161
第五章 全球化语境下的东南亚华文诗歌	169
一、世界性、民族性与中国性	170
二、东南亚华文诗歌的现代化	182
第六章 中国性诗歌典例分析	198
一、乡 愁	199
二、放 逐	209
三、忧 患	217
四、寻 根	227
第七章 结 语	237
参考文献	243
索 引	256
后 记	259

第一章

绪论

近百年来东南亚华文诗歌的发展历经波折,虽与中国现当代诗歌同出一源,但因本土化、现代化、全球化等因素的介入,已经完全不同中国现当代诗歌了。东南亚华文诗歌自成一体,形成自身的特色,演绎着自己的“传奇”,成为世界华文诗坛较为活跃的一分子。如果将欧美澳华文诗歌与东南亚华文诗歌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所呈现的中国性是不相同的。欧美澳华文诗歌自诞生以来,一直都依赖着中国大陆及港台文学市场,借助于中国的报刊和其他媒体得以发表出来,摇摆于“留学生—移民—新移民文学”之间,至今都无法形成自己的“文学场”。新移民文学作家常常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他们的作品必须回到中国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东南亚华文诗歌则不一样,它

不但诞生时间早,几乎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诗歌同时起步,而且创作较为繁荣。东南亚华人在居住国创办了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以及出版社,使得东南亚华文诗歌拥有自己的文学机制及流通、消费市场,因而独具一格。当然,如果要考察东南亚华文诗歌与中国性的关系,还必须将其放到文学史的框架里才能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一、东南亚华文诗歌发展概述

受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余波影响而诞生的东南亚华文诗歌^①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风雨历程。如今当我们站在 21 世纪的门槛上蓦然回首,发现东南亚华文诗歌不但创作繁盛,而且佳作纷陈,比之中国大陆、港台地区的汉语现代诗歌并不逊色。如果再考虑到东南亚华文诗歌所处的非主流位置和边缘的生存环境,这些成绩的取得,尤觉其难能可贵。东南亚华文诗歌虽然与中国现当代诗歌同出一源,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已经完全不同中国现当代诗歌了。它们独具一格,自成自律性的“文学场”,是世界诗

^① 东南亚地区位于亚洲与大洋洲、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是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交汇点。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山海相连,人文相通,自古以来就和中国有着密切的人员、商贸、政治和文化上的往来。东南亚地区共有 11 国,分别位于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上。中南半岛有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和泰国等 5 国,马来群岛有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和东帝汶等 6 国。华人移民东南亚由来已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总数约有 3348.6 万(庄国土,2009),绝大多数都已成为所在国的公民,成为所在国的少数民族(新加坡除外)。华人移居东南亚,自然而然地带去了自己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艺术表达形式,成为所在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据学界共识,东南亚华文诗歌是指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文莱、越南等国在内的东南亚地区用华文白话创作的新诗(基本上都为华人所创作),不包括用文言文创作的诗歌作品。

坛的一枝奇葩。近百年来东南亚华文诗歌由最初的中国文学支流(侨民文学)逐渐变为独立自主的本土文学(华文文学),留下一串串“足迹”,为我们镌刻了清晰可见的“历史”,“历史”则以其强大的记忆功能,记载下东南亚华文诗歌沉浮的“命运”,正如菲华诗人晓阳在《历史》一诗中所形容的那样:“脚下/走出/足迹//足迹/铸刻着/历史//历史/创造/我们的命运”,今天梳理这段“历史”对于东南亚华文诗歌未来发展显得相当重要。

东南亚华文文学/诗歌的兴起与当地的华人社团、华文教育以及华文报刊的创办有着莫大的关系,尤其是华文报刊的出版发行,客观上为东南亚华文文学/诗歌的发表提供了阵地。东南亚地区早在19世纪就出现了华文报,第一份华文报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印行。比较正规的华文报还有马来亚(包括现在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叻报》(1881年)、《檳城新报》(1895年)、菲律宾的《华报》(1888年)等。进入20世纪后,除了上述两个国家还不断地涌现华文报纸外,泰国、印尼、越南等国,也均有多家华文报纸陆续创办。这些华文报纸创办之后,为了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常在报纸上增设文学副刊,刊登诗、词、小说和散文。根据文学史家方修考证,东南亚第一首华文新诗《原来学生》(作者啸崖)刊登于马来亚的《新国民杂志》(《新国民日报》的副刊)上,时间是1920年2月18日,距离胡适在中国大陆文坛进行第一批白话新诗的创作尝试(《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正好3年时间。可见,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新诗创作起步较早。后来随着中国大陆政局的变动,大批中国新文学作家南来,使东南亚华文诗歌创作逐渐繁荣起来,如1923年的《益群报》上就出现了诗意盎然、韵味隽永的诗篇:“微风引逗着小草漫舞;/小鸟倚在枝头歌唱;/艺术之神看了,/不觉陶醉在‘歌声’中;/于是有个孟浪的诗人,/把‘舞影’摄在心里,/把‘歌声’藏在心里,/轻轻地把艺术之神,自然之神,都/容在心灵中。”^①1925年

^① 曼娟:《孟浪的诗人》,《益群报·天声人籁》,1923年8月15日。

10月3日,《新国民日报》特地开辟了诗歌副刊——《诗歌世界》。这是一个“新旧合璧”的诗刊,当时新诗与旧诗(旧体诗)几乎参半。东南亚第一个真正的新诗刊出现于1927年10月5日,它是马来亚的《南洋时报》所开辟的《诗》副刊。方修曾经比较《诗歌世界》与《诗》说:“《诗》是马华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诗刊^①。它和早期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出版的《诗歌世界》不同,它不是那么一个新旧合璧的诗刊,而是一个真正的新诗刊,虽然有时发表几首竹枝词或什么杂咏,但这些作品在这里已完全处于一种附庸的地位,一点也无足轻重了。”^②可惜《诗》的出版时间并不长,大约只维持了一年半,中间还因《南洋时报》停刊,停版数月,但其在东南亚华文诗歌史上所做的筚路蓝缕的开拓工作是值得肯定的。东南亚华文诗歌自发韧起,基本上就与中国现代诗坛同步共振。如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文坛一直提倡的“革命文学”思想在东南亚地区迅速传播,但“革命文学”在东南亚变成“新兴文学”的提法(为了不引起西方殖民者的注意),实质还是“普罗文学”,正如《檳城新报》副刊《椰风》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布尔文学既成过去,自有当代的文学继起。目前是一个狂风暴雨的大时代,自然需要适合狂风暴雨时代条件的文学,普罗文学因了社会意识继相的反映,禀赋了历时任务,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而继代着布尔文学时间与空间领域而努力她文化的新工程。”^③

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尤其是中国爆发全面抗战的前后几年,在中国大陆如火如荼的抗战形势影响下,东南亚各地华人同仇敌忾,纷纷成立各种抗战组织与文艺团体,如马来亚的“吼社”、菲律宾的“黑影文艺社”“新潮社”、泰国的“彷徨学社”“椒文学社”、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的“印华文学社”和“椰岛文艺社”等团结了一大批华文诗人;同时,出于政治宣传需要的各种华

① 笔者注:《诗》既是马华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份新诗刊,也是东南亚地区第一份新诗刊。因为在东南亚地区,当时的马来亚华文文学创作起步最早。

② 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新加坡世界书局1975年版,第100页。

③ 见《檳城新报》副刊《椰风》发刊词,1929年4月27日。

文报刊层出不穷地涌现,如马来亚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槟城新报》《光华日报》、菲律宾的《东方日报》《联合日报》《菲华时报》《华侨商报》、泰国的《华暹新报》《中华民报》《天汉公报》、印尼的《朝报》《汇流》《新村》《苏门答腊民报》等相继创设文艺副刊,宣传中国抗战文学口号,呼唤大家起来积极抗日救亡,客观上为华文诗歌创作趋向繁荣提供了阵地。《槟城新报》副刊《曙光》的发刊词中列举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恶行径,编者大声呼吁青年们赶快负起抗日的任务:“几年来,我们看到了泪和血在祖国横流着。几年来,我们看到敌人们握着屠刀在逍遥。几年来,我们听到敌人们的胜利的狞笑,无时无日。屠杀,被奴隶的同胞的哀叫、呐喊、痛哭。几年来,我们更看到,许多甘心认贼作父、出卖人格、无耻的丑脸。几年来,我们也听到,为了不甘为奴隶,不愿看着一片一片河山被宰割,同胞被压迫,被屠杀,而抗战,而呐喊,而呼号,而牺牲,而灭亡!这一切的一切,尽使我们北望神州,而伤心,而堕泪,而惆怅,而憎恶。……挚爱的青年们,不要忘记,忘记横在我们面前的一线曙光。我们坚持着,打开了荆棘,便是平坦的大道。”^①由此,东南亚华文诗歌创作进入一个繁盛时期。这个时期活跃着一大批华文诗人,简单罗列如下:马华文坛(马来亚华文文坛简称,包括后来分家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有拓哥、谭云山、周均、邹子孟、段南奎、胡鉴民、静海、椰青、墨尼、陈炼青、林参天、张楚云、饶百迎、刘思等,菲华文坛有杨静堂、王雨亭、李法西、林健民、蓝天民、许冬桥、施颖洲、鲍事天等,泰华文坛有陈容子、方涛、鲁洪、林蝶衣、许征鸿、鲁心、白露、田江,等等。但1941年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东南亚各地,华人社团、华校、华文报刊均遭取缔或封闭,东南亚华文诗歌创作陷入困境,如新加坡著名诗人骆明曾回忆当时新马本土抗战文艺状况时说:“这个时期是新加坡艺术的黑暗时期,因此没有创作,不能发表,文艺园地是一片空白。只有

^① 见《槟城新报》副刊《曙光》发刊词,1936年5月4日。

一张替日本人讲话的《昭南日报》。”^①这也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各国华文诗歌创作的状况。

等到 1945 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南亚各国开始进行艰难的战后重建工作时,华人社会也在脱离苦难后恢复生机。华校、华报的复办和创办,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华文诗歌创作重新焕发活力。印华作家钟尼迟在《略述印华文坛沧桑》一文中写道:“不仅中国大陆各地的文人雅士,皆有志一同地纷纷南来印尼作客游,各处风景名胜间皆留下雪泥红爪,同时也给印尼社会带来极盛的文风,据传说,当时的诗、词、歌、赋及各式佳作,便如雪片纷飞般蔚为奇观。”^②菲华作家施颖洲也形容当时菲华文坛繁盛之状:“犹如‘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十分热闹,盛况空前。”^③其他各国情况都差不多,华文诗歌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机。同时,与东南亚各国反对殖民统治、要求独立建国的形势相适应,特别是中国政府周恩来总理在 1955 年万隆会议上宣布“取消双重国籍”^④的政策,更是让东南亚华人在政治身份和文化心态上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反映在文学层面就是东南亚华文诗歌创作的内容也开始发生重大的、质的变化,由以前的根据回忆和遥想中国社会生活转向面向本土现实,华文诗人的心态也由原来的“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转变。泰华作家方思若曾就泰华文坛的状况对这一转变进行了梳理:“进入了(20 世纪)50 年代,也就是华文文艺开始的年代。……以怀想思绪描绘故国风物为主要

① 骆明:《立足本地放眼海外》,《新加坡当代华文大系·诗歌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1 年版,第 3 页。

② 钟尼迟:《论述印华文坛沧桑》,《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第 46 期,第 68 页。

③ 施颖洲:《六十年来菲华文学》,《菲华文艺》,菲华文艺协会 1992 年版,第 4 页。

④ 1955 年印尼万隆召开亚非各国会议,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会上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取消海外华侨华人的双重国籍政策:一方面欢迎海外华侨早日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一方面也欢迎海外华人扎根当地,融入本土。中国政府取消双重国籍的政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有利于外籍华人融入当地社会,二是有利于他们作为当地少数民族争取民族平等的权利,三是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清除所在国可能存在的疑虑,四是有利于加强所在国与中国的关系。

题材的侨民文艺已不适时宜,继之而起的是反映此时此地的文艺作品逐渐抬头。……战后初期学习华文风气曾炽盛过相当一段时间,参加学习的这批土生土长的青少年,他们的文艺写作能力在进入 50 年代便告先后成熟,而在泰华文坛上形成主力,这支生力军在思想感情和写作的题材上都倾向当地化,这和以前中国南来文化人怀旧怀乡的华侨文艺有着根本性的差别。”^①这非常贴切地说明了当时东南亚华文诗歌的创作开始转向表现对南洋本土的热爱和融入之情。

可惜的是,东南亚各国并不十分信任华人。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支配下,各国政府相继出台同化政策限制和压迫华人社团的发展以及华校、华报的创办。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在不同时期都兴起过排华浪潮。如自古以来和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越南,在 1975 年统一以后,和中国关系交恶,导致在越华人纷纷逃离。据不完全统计,1979 年至 1989 年间,约有近百万华人被迫逃离越南,再移民或回归中国。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越关系才逐渐好转。老挝和柬埔寨也在不同阶段实施过排华政策,迫使华人再移民,导致当地华人口锐减。

“二战”后,泰国和菲律宾政府实施较为温和的同化政策,排华运动时有发生,但大多数华人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归化为当地公民。新加坡于 1965 年独立后,成为由华人执政掌权的国家,且华人都以新加坡公民身份自居,华人口也占了 75% 以上,不存在排华现象,但西化现象逐渐突出。马来西亚在东南亚地区可以说是保存华人社会较为完整的一个国家。马来西亚虽然于 1969 年也曾经发生“5·13”事件,导致排华和流血冲突,并且国家实施同化政策也较为严重,但整体而言,种族关系还比较和谐,由此也形成了马来西亚

^① 方思若:《泰国华文文艺回顾与前瞻》,载《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文集》,泰国华文作家协会 1991 年版。

华人对华文的坚守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依恋,这是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难以企及的。印尼的排华运动曾经最为严重,1965年“9·30”事件爆发后,当地政府实行极端的排华政策:“不但所有的华人社团、华校、华报均遭取缔,所有的华文书籍、图书馆,包括个人的藏书也遭焚毁,而且严禁来自任何地域的华文书报刊物进口,更有甚者,连方块字的使用也成为危及当地华侨华人身家性命的违法之举。全国只剩下一份由印尼当局情报部门督办的一半中文一半印尼文的《印度尼西亚日报》。”^①直到1998年,印尼政府的政策才有所松动,30多年的时间使印尼成为“全世界唯一不准华文存在的地域”,只剩下一份半中文半印尼文的《印度尼西亚日报》,偷偷地维系着华文诗歌创作命脉。以上东南亚各国的这种状况毫无疑问制约了东南亚华文诗歌的发展。

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东南亚各国与中国交流日益频繁,双方逐渐恢复了正常的邦交关系,各种限华政策开始松动,客观上又使东南亚华文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老中青三代诗人齐集一堂,全国性的社团和文联组织得以成立,多元化格局开始形成。这一时期确实是东南亚华文诗坛“莺飞燕舞,百花齐放,争妍斗艳”的时代。可是,困境依然存在。东南亚华文诗歌诗质薄弱、西化严重、艺术性不高以及受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冲击,这些都成为制约东南亚华文诗歌深层发展的因素。当然,不管怎样,这个时期活跃在诗坛的华文诗人不但逐渐为中国的读者所熟悉,而且也在世界华文诗坛甚至世界诗坛占有了一席之地。新加坡的陈瑞献、王润华、淡莹、周粲、原甸、严思、槐华、潘正镭、贺兰宁、郭永秀、文恺、南子、林也、梁钺、董农政、希尼尔、长谣、喀秋莎、古琴等,马来西亚的吴岸、吴天才、温任平、温瑞安、黄昏星、周清啸、张树林、许友彬、谢川成、田思、李宗舜、叶明、小曼、林幸谦、陈强华、周锦聪、陈大为、钟怡雯、傅承得、游川、何启良、辛金顺、

^① 转引自饶艾子、杨匡汉主编:《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